

唐诗辨伪 ⑤ 书画鉴定

——以张旭为例

■ 凌郁之

摘要:《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共计收录张旭诗歌十首。今据考证,其中有七首与宋人重出,另三首也在疑似之间。造成这种重收互见的原因,可能在于最初辑录者对书画作品中诗歌之误判。与其说洪迈误判了张旭、蔡襄二人的诗歌,毋宁说他误判了他们的书法作品;与其说洪迈在辑录诗歌时出了问题,毋宁说是在书画鉴定上出了问题。而陶宗仪、文徵明等人的题跋鉴定,又误导了我们今天对所谓《张长史缣素四诗帖》的辑佚工作。张旭伪诗现象,不是孤例,在唐宋时期的总集、别集编纂中,往往有之。

关键词:全唐诗 张旭 辨伪 书画鉴定
DOI:10.16093/j.cnki.ccc.2015.03.007

《全唐诗》收录张旭诗歌六首,《全唐诗补编》补录四首,张旭诗歌总计十首。今据考证,发现其中有七首与宋人重出,另三首也在疑似之间。造成这种重收互见的现象,其原因可能源于最初辑录者对书画中诗歌之误判。此类误收互见的现象,在唐宋集部中,往往有之。本文姑以张旭为中心,兼及怀素、苏轼等人,揭示此种现象,但愿对唐宋诗歌辑佚、辨伪工作不无裨益。

为了便于说明,请先将《全唐诗》卷一一七所录张旭六首诗抄录如下:

清溪泛舟

旅人倚征棹,薄暮起劳歌。笑揽清溪月,清辉不厌多。

桃花溪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山行留客

山光物态弄春辉,莫为轻阴便拟归。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春游值雨

欲寻轩槛列清尊,江上烟云向晚昏。
须倩东风吹散雨,明朝却待入华园。

春草

春草青青万里余,边城落日见离居。
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

柳

濯濯烟条拂地垂,城边楼畔结春思。
请君细看风流意,未减灵和殿里时。

众所周知,莫砺锋先生已经在文章中考证了《桃花溪》、《山行留客》、《春游值雨》三诗是宋人蔡襄之作^①。笔者完全同意,亦不再重复考辨。而对于《全唐诗》所收另外三首,我却也表示怀疑,申述如下:

作者简介:凌郁之,文学博士,苏州科技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所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BZW086)的阶段性成果。

^① 《〈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页42—50。

1. 关于《春草》诗。

这首诗出自张旭《春草帖》。但是,关于此帖,尚存种种疑问。虽然《宣和书谱》著录有《春草帖》之目,但并未说明该帖所书之具体内容。直到南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五《张长史春草三帖》,才第一次“展示”所谓“春草帖”,云:

春草青青千里余,边城落日见离居。
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雁书。旭书。
隐之。

并有“升元□年十一月□日重题印”一行。升元,是南唐李昇年号。

考此帖凡有三本,岳珂说:“其一得之中都,本江南李氏故藏,有建业文房三印,并古印二,文房官职衔雁行于左,刻在御府帖中。其二得之京口钟氏,卷左亦有文房印识二,古印一,并续卷后,缝有小玺七。其三得之忠训郎苟梦玉。苟使蒙古,还至云中,以香彝易得之。祐陵金字宸奎在焉,首尾著政和、宣和八玺,亦有内府图书玺。”又说三本皆是真迹,但同时岳珂也对“一诗三帖”表示了怀疑,云:“然一诗三帖,岂伯高(郁之按:张旭字伯高。)平生于此篇每切寄意,正犹大令作《洛神赋》,人间合常有数本之比耶?”至于后来明清书画图谱著录相承,而诸家均未提及“建业文房”诸印,盖已非岳珂所见之旧,或又是后出之贗品。

我以为,此帖还有一些疑点。如岳珂著录之本,落款:“旭书。隐之。”其中“隐之”二字,向来无人发问。此“隐之”二字在“旭书”二字之后,似应作张旭字号来解释,而历来书志均未见有称张旭字隐之者,是不可解。再者,玩味这首《春草》诗,如“万里边城”、“海上三年”、“云间一

纸”之类语境,似乎与我们一般所熟知的张旭相去甚远。诗风其实也俗,“情知”、“不寄”云云,尤觉轻浮。这些也是疑点。

因此,笔者认为,虽然《春草帖》在《宣和书谱》卷一八张旭名下有著录,但不能据以认定彼《春草帖》一定就是此《春草》诗。就像张旭名下所著录之《秋深帖》,并非一首“秋深”诗一样。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怀疑,即有人根据《宣和书谱》所著录“春草帖”之目而取“春草诗”来假冒。毕竟这样的作伪现象,在书画收藏史上,是确实存在的^①。

2. 关于《柳》。

这首诗被收作张旭诗,也是因法帖而起,即汪砢玉《珊瑚网》卷二所收《濯烟帖》,“上有明昌宝玩、御府宝绘、群玉中秘诸印”。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三、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七著录相同。但是,《宣和书谱》卷一八张旭名下并未著录此帖。很难想象,五百年间未见著录而一朝忽现。这样的作品,其真实性不无可疑。

我对这首诗的怀疑,还有一点,即这首诗中“灵和殿”一事,用典工稳,不像出自盛唐人之口。“灵和殿”这个典故,出《南史》卷三一《张绪传》:“刘俊之为益州,献蜀柳数株,枝条甚长,状若丝缕。时旧宫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于太昌灵和殿前,常赏玩咨嗟,曰:‘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其见赏爱如此。”唐人用灵和殿事咏柳,并不多见。张旭而外,李商隐曾用之。《垂柳》诗:“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东。朝佩皆垂地,仙衣尽带风。七贤宁占竹,三品且饶松。肠断灵和殿,先皇玉座空。”(《李义山诗集》卷上)又,陆龟蒙《自遣诗》:“水国君王又姓萧,风情由是冠南朝。灵和殿下巴江柳,十二旒前舞翠条。”(《甫里集》卷一)仅此数例而已。而在宋人

^① 钱泳《履园画学》:“作伪书画者,自古有之,如唐之程修己,伪王右军;宋之米元章,伪褚河南,不过以此游戏,未必以此射利也。国初苏州专诸巷有钦姓者,父子兄弟俱善作伪书画,近来所传之宋元人如宋徽宗、周文矩、李公麟、郭忠恕、董源、李成、郭熙、徐崇嗣、赵令穰、范宽、燕文贵、赵伯驹、赵孟坚、马和之、苏汉臣、刘松年、马远、夏珪、赵孟頫、钱选、苏大年、王冕、高克恭、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诸家,小条短幅,巨册长卷,大半皆出其手,世谓钦家款。……从此遂开风气,作伪日多。就余所见,若沈氏双生子老宏、老启,吴廷立、郑老会之流,有真迹一经其眼,数日后必有一幅,字则双钩廓填,画则模仿酷肖,虽专门书画者,一时难能,以此获巨利。”(黄宾虹、邓实编《美书丛书》初集第一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页183。)

诗中,始常用“灵和殿”、“灵和柳”事^①。且看宋人杨修《六朝遗事杂咏》之《灵和殿》诗:“得地恩深雨露遍,丹墀左右玉阶前。君王属意君知否,恰似风流美少年。”与所谓张旭《柳》诗,几近神似,而李商隐、陆龟蒙诗中灵和殿句法,反觉简易。

3. 关于《清溪泛舟》。

这首诗与《桃花溪》、《山行留客》、《春游值雨》三首,都被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收在张旭名下。《万首唐人绝句》也是我们目前所知这四首诗被收作张旭诗的最早出处。而其中三首已被证伪,那么这一首是否一定就能岿然独存?另三首是蔡襄的诗,这一首是否蔡襄佚作?看来,还不好说。

我们注意到,直到明初,高棅编《唐诗品汇》收此诗,作者署“张颠”,而保守地置于“有姓氏无字里世次可考者五人”之列(《唐诗品汇叙目》),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此“张颠”就是“张旭”。考《万首唐人绝句》,亦作“张颠”,不作张旭。(高棅依据的可能就是《万首唐人绝句》)盖洪迈在收录之时,已有考虑。他们之所以署作“张颠”而不作“张旭”,一定是因为其所依据的文本上就是“张颠”,因仍其旧而已。因此,洪迈、高棅这样做,我们可以看作是审慎的态度。若他们认为此“张颠”就是张旭,那定会直接题署“张旭”,因为全书体例皆称实名,无称绰号者。再进一步推理,如果洪迈所见的文本原件上所题就是“张颠”,那几乎可以肯定此文本不出自张旭之手,因为张旭决不会用“张颠”这个绰号来落款的;若此文本原件落款真是“张颠”,则可以断定其是伪作。

二

我们再看业师陈尚君先生《全唐诗补编·

续拾》卷一一补张旭诗四首:

杂咏

既作湖阴客,如何更远游? 章江昨夜月,送我过扬州。

见远亭

高亭□可望,朝暮对溪山。野色轩楹外,霞光几席间。

晚过水北

寒川消积雪,冻浦渐通流。日暮人归尽,沙禽上钓舟。

三桥

北临白云涧,南望清风阁。出树见行人,隔溪有鱼跃^②。

皆辑自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七所著录《张长史四诗帖》,目下原注云:“草书缣素本。”有陶宗仪跋云:“张长史缣素四诗帖,《宣和书谱》所载,初为蔡忠惠公家藏,后入御府,自裕陵旧观,流离迁徙,不知几经兵燹,而翰墨无恙,信神物之有呵护也。至其笔法纵横,跌宕飞舞,即长史自云‘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真可谓入神出圣,不可方物,非学者所能称述也。”盖以为此帖即是《宣和书谱》卷一八张旭名下之《缣素帖》。

今按,第一首《杂咏》,见王安石集中。《临川文集》卷二六《杂咏四首》之二:“已作湖阴客,如何更远游? 章江昨夜月,送我到扬州。”题目相同,文字仅两字不同。

第二首《见远亭》,也见于王安石集中,即《临川文集》卷一六《见远亭上王郎中》之前四句。全诗云:“高亭豁可望,朝暮对溪山。野色轩楹外,霞光几席间。树侵苍霭没,鸟背夕阳还。草带平沙阔,烟笼别戍闲。圃畦荷气合,田

^① 例如,杨亿《武夷新集》卷五《故比部李郎中挽歌四首》之三:“风韵灵和柳,襟怀叔度陂。”李之仪《姑溪居士后集》卷四《维扬会张曼老陈莹中分韵得柳字》:“一逢可意人,似对灵和柳。”宋庠《元宪集》卷一二《闰十二月望日立春禁中作》:“水从太液池边动,柳向灵和殿里看。”

^② 陈尚君先生在篇末有按语云:“均见《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七引《张长史四诗帖》。此帖末有柯九思、高仁卿、陶宗仪等跋。陶跋云此帖‘《宣和画谱》所载,初为蔡忠惠公家藏,后入御府’。”《杂咏》“章江昨夜月”,月,《补编》作“雨”。(《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页830。)

径烧痕斑。樵笛吟晴坞，渔帆出暝湾。登临及芳节，宴喜发朱颜。夹砌陈旌旆，褰帘进佩环。观风南国最，应宿紫宸班。康乐诗名旧，芜音讵可攀。”李壁《王荆公诗注》卷二五，题下注云：“此诗元有十韵，旧本却作绝句刊。今得全篇足之。”

第三首《晚过水北》，又见欧阳修《文忠集》卷一〇，题目、文字全同。

第四首《三桥》，即欧阳修《文忠集》卷五四《和人三桥》之二：“北临白云涧，南望清风阁。出树见人行，隔溪闻鱼跃。”文字有两处小异而已。

我想，大概不须用更深密的考证，就能认定四首诗应属王安石、欧阳修了。但是，这又是如何造成的呢？可能还是因法帖误判所致。如果没有《宣和画谱》所著录的“空头的”《缣素帖》（因为没有叙说此帖内容，故我称是“空头的”），或许就不会有这所谓的“张长史四诗帖”。所谓“四诗帖”，只是后人伪作以冒充《缣素帖》而已。虽然《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有陶宗仪、文徵明等元明人题跋，但此“四诗帖”并不见于宋元书画图谱，故不敢不疑。甚至陶宗仪、文徵明等人的题跋，也可能一并是伪造的。

三

以上我们分析了《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张旭十首诗，其中七首与宋人重出，基本可以确定不属张旭了。那么，这些诗是怎么被认为、并被收作张旭的呢？

诚然，《全唐诗》所收《桃花溪》、《山行留客》、《春游值雨》三首诗是经《万首唐人绝句》才第一次进入总集，但洪迈何以收录这三首诗？或者说，洪迈何以误收这三首诗？

我以为，洪迈的依据可能在法帖、拓本之中。洪迈一定有他的依据，而肯定不是有意从蔡襄集中取来作伪。我们业已注意到，被证伪的这七首，几乎都是先被认为是张旭的书法作品，而后才被视作张旭诗作的。也就是说，法帖

误判，是致误之因。

考杨慎《升庵诗话》卷一〇《张旭诗》：“张旭以能书名，世人罕见其诗。近日吴中人有收其《春草帖》一诗，陆子渊为余诵之，所谓‘春草青青万里余，边城落日见离居。情知塞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可谓绝唱。余又见崔鸿胪所藏有旭书石刻三诗，其一《桃花矾》云（略），其二《山行留客》云（略），其三《春游值雨》云（略）。字画奇怪，摆云挨风，而诗亦清逸可爱，好事者模为四首悬之。《春草》一首真迹，藏江南人家。”《桃花矾》等三首诗，与《万首唐人绝句》所收正同。洪迈所见，或许就是这里所谓的“旭书石刻”。若然，就不能轻责洪迈了。

至于《全唐诗补编》四首，也就是所谓的《张长史四诗帖》。帖末有陶宗仪、柯九思、文徵明等名家题跋，言之凿凿，岂能不信？若不是我们今天在技术上拥有较强的辨伪能力，前辈要想明辨，谈何容易。因此，这不是陈尚君先生《全唐诗补编》的错，而是陶宗仪、卞永誉的错；再追究下去，终归是书画作伪者的错。

至于为何偏偏是蔡襄、王安石、欧阳修的诗被收作张旭诗，这可能就要从书法、仿拓、收藏、临摹这样的角度来探讨了。

即就蔡襄与张旭而言，两人虽然相隔数百年，而仍然存在着密切联系的纽带，即蔡襄家所藏的张旭法帖。董道《广川书跋》卷七《张长史草书》跋语云“莆田方宙子正得君谟所藏张长史帖”云云。《全唐诗补编》所收《张长史四诗帖》，前揭《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七所载张旭帖后有陶宗仪跋云，此四诗帖“初为蔡忠惠公家藏”。蔡忠惠，蔡襄字君谟也。虽然这四首诗不是蔡襄的，但毕竟蔡、张两人之间已然有联系。以上我们业已指出这四首诗与王安石、欧阳修互见，而王、欧是蔡襄同时之友朋，其间若发生文字收录方面的错乱，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回过头来，再看洪迈如何误收张旭诗歌的问题。陈寅恪先生说：“惟南宋之洪迈，博学通识之君子也。”^①洪迈家富藏书，好古博洽，知名于代。马廷鸾说：“洪氏为鄱阳文章家，奥篇隐

①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琵琶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页 51。

帙萃焉,法书名画特土苴耳。”^①那些与张旭、蔡襄有关的书法作品可能正在其中。其误收蔡襄为张旭,或即因此缘故,而决非态度之草率,更非为了编《万首唐人绝句》而取来凑数。至于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前人已有批评,但是否草率,我不敢苟同。须知道,这样的书编成后要送皇帝看,有谁还敢轻率呢?我们古代编写态度最认真的书,莫过于皇帝要编或为皇帝而编的书了。至于洪迈的治学态度,我们可以从《容斋随笔》看的出来。前人评曰:“援引该洽,证据辩论,极为精详。”(史绳祖《学斋佔毕》卷四)笔者曾经撰有《〈万首唐人绝句〉版本源流与文献价值的重新认识》一文,认为前人对此书的批评往往失之偏颇,并影响了今人对此书的看法^②。试想,即使在今天,我们如果不借助《全唐诗》以及大型电子文本,要想编一本“万首唐人绝句”,仍是难以想象、难以完成的。其实,综合多方面要素,洪迈在当时恐怕是编纂《万首唐人绝句》的最佳人选。

因此,与其认为洪迈在辑录诗歌时出了问题,毋宁认为是在书画鉴定上出了问题;与其说洪迈误判了张、蔡二人的诗歌,毋宁说他误判了他们的书法作品。这样说,可能比较合适一些。即使像洪迈这样博学而严谨的学者,也会在书画真伪的鉴定方面出问题。同理,如果前引陶宗仪、文徵明等人跋语不是伪造的话,那么,他们对所谓的“张长史四诗帖”也显然鉴定错了,并误导了我们今天的辑佚工作。

四

张旭伪诗现象,不是孤例。我们发现,与张旭齐名并称的长沙草书僧怀素,其诗歌也有类似的与宋人互见的问题。《全唐诗》录怀素诗二

首,其一《题张僧繇醉僧图》:

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挂一壶。
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入醉僧图。

此诗又见《东坡全集》卷二九,即《题怀素草帖》。不过,这个问题似乎已得到解决。一般认为是苏轼临怀素诗帖,而后人误以编入者^③。

其实,我们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排除苏轼作此诗的可能性。所谓怀素“人人送酒”诗,始见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僧繇曾作《醉僧图》传于世。长沙僧怀素有诗云:(略)”但是,检《宣和画谱》卷一御府所藏张僧繇名下并无《醉僧图》。所谓“传于世”者,不明为何物。《宣和书谱》卷一九怀素名下有《醉僧图诗》,或即“人人送酒”诗,而此图或即李公麟所作、苏东坡所题者也。窃又以为,怀素“人人送酒”诗,其中“草圣”二字,似非怀素本人口吻。所谓东坡“每爱此诗,时时写之”的话,也是见于后人跋语,故未足凭信,故仍似不能排除为东坡所作的可能^④。

至于《全唐诗》所录怀素诗二首之《寄衡岳僧》:

祝融高座对寒峰,云水昭丘几万重。
五月衲衣犹近火,起来白鹤冷青松。

也有值得追问的问题。我们发现这首诗与晚唐曹松《送僧入蜀过夏》诗非常相近。曹诗云:

师言结夏入巴峰,云水回头几万重。
五月峨眉须近火,木皮领重只如冬。(《全唐诗》卷七一七)

① 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一五《跋山谷刘梦得竹枝歌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万首唐人绝句〉版本源流与文献价值的重新认识》,《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页31—38。

③ 查慎行《苏诗补注》卷五〇:“慎按:石刻,先生自题云:‘此怀素诗也。仆好临之,人间当有数百本也。’后人不加深考,遂讹以此诗编入集中耳。又按《万首唐人绝句》载此诗,亦以为怀素作。今据此驳。”

④ 汪柯玉《珊瑚网》卷二六李龙眠《醉僧图》,东邨闲居方外棠宇叟跋语。不过,怀素的这首诗,除了与苏轼的“官司”之外,我还发现一说,即《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六五录此诗,作者署为唐僧法照,又不知何据。法照,大历、贞元间僧人。《全唐诗》卷八一〇收诗三首,《补编》补辑二首,均未言及此诗。

两首不仅韵同,字面上也多有相同。孰先孰后,孰为仿作,难以遽定。但毕竟事出蹊跷,有待商量。

综上,张旭、怀素这两个以书法名世的诗人,其诗歌每每有此相似的问题,可能就不是偶然了。

因书画作品而误判诗作的现象,推测起来,大体有下面几种情形:一,后人仿临前人诗文真迹(包括法帖、拓本之属),而被误为此后人之作。二,后人用前人书体所书自作之诗,而被误为此前人之作。三,后人题写前人之诗,而被他人误为此后人之作。四,后世伪造前人书画,伪题诗作,以致淆乱。

像张旭、怀素这样具有巨大影响的书法家,其帖多经后人所临摹,其字体多为后世所习知,仿其书体之书法作品甚多,时移世易,容有难辨古今、张冠李戴^①,遑论故意作伪、鱼目混珠呢!

五

在唐宋时期,在总集、别集编纂中,此类误收互见的现象,往往有之。

即使在同一时代,甚至兄弟友朋之间,这种误判误收现象也时见发生。苏轼、苏辙集中,就不只一处混收互见的篇章。如《东坡全集》卷二七《题卢鸿学士堂图》,此篇又见苏辙《栾城集》卷一五,题《卢鸿草堂图》。又如《东坡全集》卷九五《李伯时作老子新沐图遗道士蹇拱辰赵郡苏某见而赞之》,又见苏辙《栾城后集》卷五,题

《沐老图赞》。又如黄庭坚《山谷集》卷一四《钱忠懿王画像赞》,又见《东坡全集》卷九四,题《忠懿王赞》;又或以为蔡襄之作^②。

试问以上这些现象又如何解释,又如何区判?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误收决不是别集编者明知而故意为之。大苏、小苏这两篇误收互见,都是因题画而误判。背后的两幅画,正是他们的好友李公麟所作《沐老图》(又题《老子新沐图》)及《写卢鸿草堂图》。一定是在二苏身后才发生误会,决不是兄弟争抢署名权。盖兄弟友朋之间,书翰往来,诗文传阅,相互之间藏有对方的诗文手稿或副本,而在他们去世之后,其门生子弟编纂家集时,就可能难分彼此而误判。

像蔡襄、苏轼这样的文艺大家,其所收藏之法帖甚多,所临摹、所题写之卷轴甚多,作诗题画之纸本甚多,他人仿临甚或伪造者亦甚多,万一相混,可能会给后人在收集其作品时造成很大的麻烦。

另外,不仅写诗题画容易发生这样的误收,日常生活中,如题壁、题写扇面、题写屏风之类,也可能造成让他人难以分辨作者而误判误收的问题^③。设若张继《枫桥夜泊》,古往今来千万人题写过,落款往往是“某某书”,因我们都知道这是张继的诗,否则可能也会误以为此诗就是此“某某书”者所作。诗文误收的道理类此。兹别举一例,张籍《题虎丘》诗云:

望月登楼海气昏,剑池无底锁云根。

^① 高濂《燕闲清赏笈·论帖真伪纸墨辨正》:“法帖真伪,一时入手,少不用心着眼,即不能辨。观唐萧诚伪为古帖以示李邕曰:‘此右军书也。’邕忻然曰:‘是真物也。’诚以实告,邕再视曰:‘果欠精神耳。’北海且然,况下者乎?”(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三集第十辑,页169—170。)

^② 《蔡忠惠集外集》二《佚文》。《蔡襄集》,吴以宁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774。原注云转引自《全宋文》卷一〇一九。

^③ 兹举一例。洪迈《容斋四笔》卷一三《二朱诗词》:中书舍人新仲翌,“十八岁时,戏作小词,所谓‘流水泠泠,断桥斜路梅枝亚’者。朱希真见而书诸扇,今人遂以为希真所作。又有折迭扇词云:‘宫纱蜂赶梅,宝扇鸾开翅。数折聚清风,一捻生秋忆。摇摇云母轻,袅袅琼枝细。莫解玉连环,怕作飞花坠。’公亲书稿固存,亦因张安国书扇,而载于《于湖集》中。”

老僧只恐山移去,日暮先教锁寺门。^①

明初苏州诗人高启有一首《虎丘》诗(《大全集》卷一八),仅两字之不同,应该被看作一首诗。如果我们相信这是张籍诗的话,那么,又怎么出现在高启集中呢?我想高启本人不会如此无聊,在古人集中作贼,而一定是他曾题写张籍这首诗,被他人误收入其集中。

另如黄庭坚《谪居黔南十首》与白居易之间的“笔墨官司”,也是值得分析的案例。有人以为,山谷此组诗,“尽用乐天大篇裁为绝句”。有人以为,“盖山谷《谪居黔南》,是取乐天江州、忠州等诗偶有会于心者,摘其数语,写置斋阁,或尝为人书,世因传以为山谷自作”^②。钱锺书说:甚至黄山谷明明是默写白居易的诗,记错了几个字,他的崇拜者也以为是黄山谷“点铁成金”之法,“可为作诗之法”,替他加上一个题目,

收入他的诗集^③。总之,这组诗确实造成了读者的一些困惑。而王若虚一定要批评山谷为“剽窃之黠者耳”(《溇南集》卷四〇《诗话》),则是缺乏理解之同情。

我们辨伪不能做王若虚,一见异同,即疑剽窃。清乾隆皇帝有《再题李公麟醉僧图》诗,有按语云:“是一诗也,或云怀素,或云东坡;一书也,或云老泉,或云东坡。鉴赏者但当论书画之佳否,不必泥纪载之纠纷。与其轻信,无若阙疑。”(乾隆《御制诗五集》卷二三)这也是今天我们对待那些互见重收而尚难遽定的诗歌应该持有的态度。

总之,唐宋诗歌重收互见的问题比较严重。张旭诗歌与蔡襄、王安石、欧阳修之互见,是比较典型的案例。对名家书画作品以及题跋的误判,容易导致并已经导致集部的误收。这是我们在做唐宋集部整理工作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① 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上:“《容斋三笔》载吴门僧惟茂住天台山,有诗云:‘四面峰峦翠入云,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午先教掩寺门。’唐张籍《题虎丘》诗云:‘望月登楼海气昏,剑池无底锁云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暮先教锁寺门。’惟茂蹈袭张诗二句,容斋亦受其欺而记之耳。”钱锺书《谈艺录》七六:“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引宋人诗云:‘老僧只恐云飞去,日午先教掩寺门。’《容斋三笔》卷十二载僧惟茂住天台山诗云:(郁之按:即俞弁《诗话》所引,略)。后来高青丘《虎丘》云:‘望月登楼海气昏,剑池无底锁云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落先教锁寺门’,(郁之按:见高启《大全集》卷一八。按此即《逸老堂诗话》所举之张籍《题虎丘》诗也。)盖全袭此;而南宋俞桂《渔溪诗稿》卷二《虎丘》云:‘寺僧未晚山门闭,不放闲云一片飞’,子才误合二诗词意为一耳。(钱锺书原注:“明俞弁《山樵暇语》卷四驳容斋,谓此乃张籍《虎丘》诗,余检《司业集》未见。”郁之按:在《张司业集》卷七。)”

② 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卷一二。“裁为绝句”之说,为任注所引曾慥《诗选》所持观点。至于删律、古为绝句,其实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如旧题刘克庄所纂《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即存在严重的截律、古为绝句的问题。可参笔者所作《〈万首唐人绝句〉版本源流与文献价值的重新认识》,《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页36。这种现象,当然也极易造成误收的问题。

③ 参钱锺书《宋诗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页157。